

論

著

選

粹

中唐詩文新變

吳相洲◎著

中唐詩文新變

◎著者：吳相洲

商鼎文化出版社

1996年8月1日

第一版／第一刷

中唐詩文新變

著 者：吳 相 洲

發行人：廖 雪 鳳

登 記 證：行政院新聞局局版台業字第 5221 號

出 版 者：商鼎文化出版社

地址／台北市金山南路二段 138 號 2 樓

電話／ (02) 395-2248

傳真／ (02) 396-2195

郵撥／第 18185210 號 本社帳戶

INTERNET 網際網路站址：

<http://chienhua.com.tw/chienac.htm>

E-Mail: leo@chienhua.com.tw



法律顧問：呂沐基律師

編輯主任：甯開遠

製 版：明國照相製版公司

印 刷：雨利美術印刷公司

裝 訂：義明裝訂廠

定 價：280 元

序

葛曉音

前些年，或許是因國內學術界重視宏觀研究的緣故，從事唐代文學研究的部分博士生以初盛唐或中晚唐文學的發展為論文選題，幾乎成為一種固定的思路。這種分段論法在八十年代前期是比較新鮮的，後來一屆接一屆做下去，便祇能在反復總結前人已有成果的基礎上再加發揮，結果是間有小突破而不易有大創獲。吳相洲君的論文選題依然順此定勢。此時中唐詩文的研究已全面鋪開，有了長足的進展。要想超越前人，難度就更大。於是，擺在相洲君面前的主要問題，是如何在人所共見的材料和習慣性的研究框架之中，找到自己獨特的角度？他的聰明，在於沒有像以往選擇同類题目的論文作者那樣，將當前已有研究成果歸納、整理、分門別類，然後面面俱到地闡述文學發展的特徵和原因。因為這樣做必然祇能產生綜述性的文章。即使有所創新，也被淹沒在他人的成果中，幾乎看不出自己的面目了。他祇是選擇了自己體會較深的幾個切入點，

從士人的行爲風範、思想性格、精神境界、構思方式這幾方面，分析了盛唐至中唐詩風演變的原因，提出了不少值得重視的見解。誠然，這些視角也許並不新鮮，但相洲君的長處是能憑著一種敏銳的感悟，將人們常常論及的問題歸納到某一個新的透視點上。例如關於盛唐文人希望“爲君輔弼”的大志，在論述盛唐詩的著作中已談得很多。相洲君把盛唐文人在這方面的種種表現總結爲以帝王師自居的行爲風範，確切而又新穎。在找到這個透視點以後，再分析這種行爲風範在安史之亂後消失的原因，便抓住了士風演變的主綫，猶如提綱挈領，免去了許多枝蔓。又如元白和韓孟兩大詩派的差別，也是八十年代唐代文學研究的一個熱點。有關論著各抒己見，精采紛呈，似乎很少有空白遺留。相洲君注意到這兩派士人在人生態度上一求凡俗，一求人聖的兩種對立的傾向，並著重論述了從蕭穎士、元結到韓愈一派士人以聖人自許，樹立名節，在矯世抗俗方面的共同特點，也是頗見悟性的創獲。

當然，論文中也有些觀點並非相洲君之新創，但因作了集中而系統的研究，所論也就較前人更爲深入細緻。例如“興會”作爲盛唐詩歌創作的重要特徵，雖然也常被學者提及，但因爲這是一個處於創作和批評的夾縫中的問題，祇有從作品出發上升到理論，纔有可能談透，所以近年來少見這方面的力作。相洲君從創作的構思方式著眼，著力探討了從南朝到盛唐，詩

人對“興會”的認識趨於自覺的過程，以及“興會”從盛唐到中唐的變化；並由此種變化聯系到中唐另一個重要的創作理論問題，指出韓孟詩派強調“思”和“意”的作用，是導致其詩歌風貌與強調“興會”的盛唐詩迥然不同的主要原因，也很有見地。此外，研究初盛唐人的風雅觀，雖是我較早提出的課題，但我對中唐風雅觀的演變，祇是大致勾勒了一個輪廓。相洲君則對中唐前期不同的風雅觀作了細致的梳理，分階段描繪出風雅觀逐漸演變的過程，切實中肯地分析了元白的“格力”、“骨格”說，以及元白、韓孟對哀怨文學的肯定，從而進一步充實了這一課題的研究。

吳相洲君之所以能在前人基礎上有所前進和突破，最根本的原因是從研讀原始資料入手，而不是從歸納前人成果出發。本文中較大的創獲是論述中唐古文運動與儒學思潮的關係。有關研究自八十年代以來已經比較深入。但從肅宗到德宗時期儒學思想的演變，仍不甚清晰。吳相洲君著眼於這一時期對儒術現實意義的認識發展過程，細致分析了從肅宗冷淡儒術到代宗提倡儒術，至德宗時復興儒術的階段性特點、陸贄所起的作用、劉知幾學派和古文家的承傳關係，對於古文運動的背景作了更細入的發掘。“文以明道”的觀念是古文運動的核心思想，本文把這一觀念的形成過程分成“從緣飾到明道”、“從禮樂到道德”這兩個過程。“從禮樂到道德”這一過程我已

在幾篇文章中論及，而對前一個過程則未曾注意，亦未見同行論列。本文的論述使古文明道的內涵得到了更明確的闡發。由此可見，治學雖以獨辟蹊徑、開拓課題爲上，但順著前人思路挖掘，也會獲得豐收。前提是必須立足於原始資料，善於發現前人研究遺留的空白和薄弱環節。

吳相洲君早年在內蒙古大學漢語系攻讀碩士學位，曾隨我進修一年。後任教於大連大學中文系，任古代文學教研室主任。多年來筆耕不輟，而不滿足於已有之雜著，仍思繼續深造。1992年考入北大中文系，師從陳貽焄先生攻讀博士學位。第三年因陳先生赴美講學，博士論文由我指導，故深知其寫作之甘苦。今論文即將付梓，更喜其耕耘之有成。是爲序。

目 錄

序 言	葛曉音
緒 論	1
第一章 影響詩風新變的諸要素(上)	6
第一節 行為風範的轉變	7
第二節 思想性格的轉變	31
第三節 精神境界的轉變	72
第二章 影響詩風新變的諸要素(下)	95
第一節 審美觀念的轉變	95
第二節 構思方式的轉變	127
第三章 詩風新變之描述	153

第一節	盛唐詩總體風格的界定	153
第二節	骨力遒勁風格的轉變	160
第三節	興象玲瓏風格的轉變	171
第四節	神采飄逸與平易自然風格的轉變	192

第四章 中唐文的新變 203

第一節	對儒術現實意義的認識過程	203
第二節	儒學本身的發展與古文創作	221
第三節	“文以明道”創作要求的形成過程	242
第四節	古文運動對前代文章的取捨	257

結 論 272

參考文獻 277

附 錄 282

一、導師評語	282
二、學術評閱書	284
三、同行評議書	288
四、答辯委員會決議書	302

後 記 304

緒論

安史之亂是中國封建社會前後期的分界綫。中唐作為中國封建社會後期的第一個階段，政治、經濟、文化都呈現出新的特點。相應地文學也發生了新的變化。後代文學的許多特點在此已露端倪。愛情傳奇的大量湧現，文人詞的制作都是前所未有的，傳統的文學樣式詩歌和散文的變化也十分顯著，影響相當深遠。葉燮在《唐百家詩序》中談到中唐詩新變的意義時說：“貞元元和時，韓、柳、錢、元、白鑿險出奇，為古今詩運關鍵。後人稱詩，胸無成識，謂為中唐，不知此中也者，乃古今百代之中，而非有唐之所獨，後此千百年，無不從是以斷。”可見在葉燮眼中，中唐詩歌的新變是古今詩運一大轉關。古文運動的出現對後代的散文創作也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本文所要論述的就是詩歌、散文兩種文學樣式在中唐的新變特徵及其成因，前三章論詩，後一章論文。

全面地描述中唐詩文的演變過程是個很大的工程，並非十幾萬字的篇幅所能容納，因而選擇個最佳角度來論述中唐詩文演變的主要特徵，並分析其成因，使論者方便，觀者清楚是十分重要的。衡量某一文學樣式的演變有許多指標，題材、主題、表現手法、語言、體式都可作為這種指標。但如果逐項分

析，面面俱到，不僅篇幅冗長，而且缺少整體感；反過來若祇談總體感覺，籠而統之，往往流於空泛。有鑒於此，本文在論述詩歌新變時選取了“總體風格”這一角度，因為風格是個“綜合指數”，可以相對全面地反映詩歌新變的輪廓。在古代詩歌批評當中，風格也是一個重要的範疇，人們談一個時代詩歌的變化，往往是從風格的角度來談的。同時，為了防止這種“綜合指數”的描述流於空泛，又對總體風格的內涵做了一個清楚的界定，指出盛唐詩的總體風格是由骨力道勁、興象玲瓏、神采飄逸、平易自然四個互相聯系的內容組成。描述中唐詩歌的新變就是分析這四點內容的發展變化，庶幾使總體風格的描述成爲一種“看得見，摸得著”的東西。

風格是多種因素在不同層面的共同作用下形成的，因而在分析風格變化時有必要系統地分析其成因。首先是按系統的層次性原則分析各種因素在不同層面所起的作用。影響風格的主要因素有：行爲風範、思想性格、精神境界、表現手法、構思方式、審美觀念。而風格是通過形象顯示出來的，同時又反映了事物的本質，內涵的這種多層次性決定了影響風格的諸多要素在發揮作用時也具有層次性。例如行爲風範最接近構成風格的形象特徵，精神境界最接近構成風格的本質特徵，而思想性格則介於兩個要素之間。再如表現手法、構思方式、審美觀念三個要素，從形象到精神也依次分爲三個層次。在這六個要素之間表現手法的分析理論價值不大，不做專門分析，重點分析其它五個要素。其次是按照系統的整體性原則，力圖找到形成總體風格某一項內容的多種原因，例如骨力道勁的

特點，其成因就有如下幾個方面：游俠、帝王師式的行為風範，樂觀向上的性格，高尚的精神境界，崇尚風骨的審美觀念。第三，注意考察研究對象的整個發展過程，不僅考察總體風格每項內容從盛唐到中唐的發展過程，而且要考察影響總體風格的各個要素從盛唐到中唐的發展過程。系統化本身就是科學的方法，特別有助於發現被忽視的環節。例如人們祇在談盛唐詩時纔講風雅觀，很少有人談中唐詩時提到它。其實中唐人也講究風雅的理论，祇是觀念與盛唐不同而已。因而考察風雅觀從盛唐到中唐的整個演變過程就會發現，中唐的風雅觀正是對盛唐風雅觀的繼承和揚棄，它的演變過程與詩歌風格的變化密切相關。如果沒有考察風雅觀演變全過程的系統意識，就無法發現這一過程，許多問題就無法解釋。

文章擬從“文以明道”創作要求這個角度來論述中唐文的新變特徵和成因。因為中唐文相對盛唐發生的最大變化是古文運動的出現，而古文運動的核心問題是文以明道。可以說古文運動中的一切問題都是以此為核心而展開的。綜觀韓柳古文運動的內容不外是結合現實生活以明儒家之道，因此，擬從現實生活到文章創作分四個層次來論述這一問題。第一個層次是社會政治生活。古文運動是與中唐儒學的復興相伴而生的，而儒學的復興也就是中唐人對儒術現實意義認識的提高。現實政治需要儒術，儒學隨之復興，這就是古文運動產生的社會背景。第二個層次是從儒學自身發展的角度來具體論述古文家們是怎樣把儒學和現實結合起來進行創作的。蕭李古文集團和韓柳古文集團分別隸屬於盛唐和中唐兩個階段的儒

學，這兩個階段儒學的各自特點及其聯系值得進一步探索。第三個層次是從文章創作的角度來考察古文運動的發展過程。特別是要考察作家的創作動機和文章表現內容的變化。第四個層次是從古文家們對前代文章的評價取捨中看他們如何處理“明道”和“作文”的關係。在這四個層次中，前兩個層次分析了文以明道的現實原因和理論根據，後兩個層次則是分析在創作時如何實現文以明道。

談中唐詩文的演變是以盛唐為參照系的。例如詩歌，長期以來，許多人都把盛唐詩視為典範，研究以前的詩是看它如何一步一步走向盛唐的，研究以後的詩是看它相對盛唐發生了什麼樣的變化。這個參照系是必不可少的，但並不是說越接近盛唐，詩歌的藝術價值就越高。另外，限於篇幅和能力，文中祇談中唐詩文相對盛唐的變化，對盛唐詩文特點的形成，祇有個別章節做了追溯；對中唐詩文演變對後代產生的影響，基本未做論述。

中唐詩文的演變並不是直線的勻速運動，它有一個“漸變”到“大變”的過程。從理論到創作，都可分出前後兩個時期，前期從肅宗至德初年至德宗貞元中期，後期從貞元中期至穆宗長慶末年。這種劃分主要是根據作家群體表現出來的特點，祇是一個大致的時間概念，不宜做特別嚴格的限定。例如前期詩文的某些特點在天寶時期就已經有所顯現，而後期某些作家的創作一直延續到晚唐。文中在分期的同時，又沿用前人關於中唐詩文流派的劃分，如蕭李古文集團，韓柳古文集團、韓孟詩派、元白詩派等，因為這些流派也是按創作特點來劃分

的，對描繪中唐詩文演變的輪廓是必不可少的。

關於中唐文學演變的研究，前人已經做了大量的工作，許多結論目前看來仍是不可更改的。但科學的發現不僅表現在得出一些新的結論，還表現在這些結論的推導過程當中。本文有的地方沿用了前人的結論，如對盛唐和中唐詩歌總體風格的概括，就綜合了部分前人的觀點，但在證明這些結論時本文都力求採用新的方法，選取新的途徑。這也是文章的重點所在。

以上便是對本文選題的意義、主要內容和所使用的方法的簡要說明。

第一章 影響詩風新變的 諸要素(上)

風格是作品在內容和形式的密切溶匯中所表現出來的特點。行為風範、思想性格、精神境界是作用於作品的內容，並由內容影響形式的三個重要因素。這一章主要考察從盛唐到中唐詩人們在這三個方面的變化給詩風新變帶來的影響。

從這三個要素來考察一個時代詩歌總體風格的變化是受到了林庚先生的啓發。林先生 1958 年在考察盛唐氣象時說：“盛唐氣象所指的是詩歌中蓬勃的氣象，這蓬勃不祇由於它發展的盛況，更重要的乃是一種蓬勃的思想感情所形成的時代性格。這時代性格是不能離開了那個時代而存在的。盛唐氣象因此是盛唐時代精神面貌的反映。”^①可見林先生是從“時代性格”、“精神面貌”兩個方面來把握盛唐詩的總體風格的。但林先生所說的“時代性格”、“精神風貌”和我所說的思想性格、精神境界還不盡相同。首先，林先生是就整個時代而言，我是就作家而言，二者有聯系也有差別。其次，林先生所說的“精神風貌”既是指盛唐時期人們外在的行為風範，又是指那個時代的精神實質。我所說的精神境界則是指詩人對人生意義的認識，

① 《盛唐氣象》，《北京大學學報》1958 年第 2 期，第 87 頁。

和那個時代的精神有聯系但又不是等同的。

第一節 行爲風範的轉變

盛唐是一個開放的社會，士人的精神得到了巨大的解放，表現出和以往任何時代都不相同的行爲風範。旗亭畫壁、飲中八仙、吹臺懷古、林泉優游，都展示著一代詩人志向遠大，瀟灑自由的風采。給人的印象，他們是高談王霸之略的帝王師，超凡脫俗的游仙客，任性使氣的游俠，嘯傲山林的隱士。他們指點江山，激揚文字，以古代英雄人物自期，以拯救天下爲己任。他們放聲歌唱清明的政治，坦率抗議現實的不平，確如林庚先生所說，表現出一種“蓬勃的朝氣，青春的旋律”^①。盛唐之音亦即盛唐詩的雄偉壯麗、神采飄逸、明朗昂揚的風格，首先是這種行爲風範在詩中的表現。

然而盛唐人這種昂揚瀟灑的行爲風範，自歷安史之亂以來，便消失了，或被改造了。

所謂“消失了”，是指社會環境的驟然變化，游仙、游俠式的人物不見了。進入中唐以來，詩人們很少再像李白那樣去游仙，真正的隱逸之士也減少了或不像以前那樣出名了。《舊唐書·隱逸傳》錄亂前十七人，亂後僅三人。《新唐書·隱逸傳》錄亂前十八人，亂後僅六人。關於游俠的詩也大爲減少。因爲

① 《盛唐氣象》，《北京大學學報》1958年第2期，第91頁。

戰亂使游俠們失去了橫行千里，立功邊塞的生活基礎。韋應物《逢楊開府》一詩中就敘述了他由一個“身作里中橫，家藏亡命兒”的俠少到“把筆學題詩”的過程。原因就是“武皇升仙後，憔悴被人欺”，安史之亂一起，早年的任俠生活遂告結束。

所謂“被改造了”，主要是指盛唐士人那種帝王師式的行為風範而言。盛唐人有強烈的建功立業的願望，往往以出將入相自期，因而他們很向往張良、諸葛亮、謝安那樣的帝王師式的人物風範，可以說大濟蒼生的理想與帝王師式的人物風範，一裡一外，是盛唐詩人進取熱情最突出的表現。由於這是盛唐人行為風範的最重要的一點，因此它的轉變須仔細考察。

這裡需要說明的是一個時代士人表現出什麼樣的行為風範，固然是現實環境作用的結果，但和朝廷特別是皇帝的個性愛好尚有很大關係。《新唐書·盧照鄰傳》載：“照鄰自以當高宗時尚吏，己獨儒；武后尚法，己獨黃老；后封嵩山，屢聘賢士，己已廢”^①，即從反面證明士人的行為風範與皇帝好尚的關係。可以說盛唐人那種帝王師式的行為風範是玄宗提倡的結果，而安史之亂以後這一風範被改造則與肅宗的個人愛好有關。

玄宗奉行求賢而治的治國方略。他在《春中興慶宮酺宴序》中說：“夫抱器懷才，含仁蓄德，可以坐而論道者，我於是乎辟重門以納之；作捍四方，折冲萬裡，可運籌帷幄者，我於是乎

^① 《新唐書》卷二百一十，頁5742，中華書局1975年版，以下所引《新唐書》均用此版。